

寫作與生活——作家答客問

日期：2011年4月16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30分

地點：香港城市大學 康樂樓6樓惠卿劇院

嘉賓：閻連科先生、章詒和女士、焦桐先生、許知遠先生、張大春先生、張誦聖教授、鄭愁予教授



章詒和

我為何寫作？

閻連科：

這個答案會讓大家非常失望。我小時候，生命的主題就是革命和饑餓，革命會給我帶來無限快樂，不需要學習不需要讀書，每天就背一背毛語錄。但饑餓是無法忍受的，所以我想了一個辦法。那時候，有一個作家叫張抗抗，她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。她寫了一個小說，在1975年出版，叫《分界線》。寫的內容我已經忘記了，但內容提要裡有一句令我印象深刻。那個內容提要說：張抗抗因為寫這個小說，由黑龍江的齊齊哈爾調到哈爾濱工作了。我突然發現，寫一部小說就可以從鄉下調到城裡，那我為甚麼不寫？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，而且非常勤奮。白天勞動，晚上寫小說。每年除夕，父親母親都在熬夜烤火，我便坐

在煤油燈下寫小說。等我離開鄉村，到軍隊當兵時，突然有領導跟我說：「你會寫小說？把你寫的小說寄給我看看。」我趕快給我哥哥打電話：「快把我寫的小說寄過來，有個很高級的領導要看。」過兩天，我哥哥給我打電話說：「母親燒飯烤火，已經把你的小說都燒完了。」這是我最初的寫作過程。

章詒和：

我的情況比較特殊，從小和父輩的朋友在一起。那一群人中有徐悲鴻、郭沫若、聞一多、金嶽霖、賀麟、茅盾、白崇禧等。我家廚子不錯，齊白石特別好吃，所以一到秋天他就來吃螃蟹。他吃完後一星期內必寄一個信封來，裡面是一幅巨幅的畫。他用畫來答謝我們家的那頓飯。



閻連科



張大春

這樣一群人都有個性，令周圍的一切無比生動。那一代人都走了，你現在看看中國黨史也好，中華民族共和國國史也好，還是官方所編輯的人物傳記也好，都乾巴巴的。那些生動的都被過濾掉了，剩下就像骨灰盒前面寫的那幾條。其實他們遠遠不是這樣。我就是想把父輩的那些故事講出來。有人說我寫的東西比較平靜和哀傷，因為這些人很多沒有好生，也沒有好死。我覺得這對上一輩人不太公平了。我沒有本事寫甚麼黨史、大傳記，我只能寫這些故事。

焦桐：

我可能是個負面教材。我從小就笨笨的，念國中時，我隔壁是高等學院。看著那些大學生在公園談戀愛，我從小就立志要讀大學。上高中以後，我喜歡文學，可是不知道怎樣接觸文學。念國中的時候，老師有個壞習慣，總是會在作文後第二周把作文簿帶到教室來，朗讀那個禮拜最好的作品。每次都想像那是我。當老師抱著作文簿進來時，我就心跳很快，幻想接受表揚時，我要用怎樣謙虛的態度來面對大家崇拜的眼光？可是每次我作文都是最後一名。我去偷看作文寫得最好的同學，我很驚訝他想像力為甚麼那麼豐富，但我一張紙都寫不滿就沒甚麼話可說了。我很苦惱，就去問我的好朋友，要怎麼樣才能寫好作文。他說：「多讀書啊！」我說我有，像這次英文考試這麼困難，全級只有幾個人及格，我還考八十幾分。他說我不是讓你讀課本，是讓你讀課外書。我就問他課外書是甚麼。他覺得我在開玩笑，不理我，然後我就用「我是嚴肅的」那種表情再問他一次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長。到現在，我仍記得那個眼神：充滿著同情，充滿著憐憫。他就說了一些世界文學名著的名字，我聽都沒聽過。他用同情的眼光看著我說：「我明天帶幾本借給你看。」我覺得閱讀改變了我的一生。因為我甚麼都不會，遇到喜歡的女孩子也不敢追，悶得要命又膽小如鼠。

我一讀就發現完全沒辦法回到教科書裡面去，深深地著迷了。那個暑假我抱著練習武林秘笈的態度閱讀課外書。我記得第一本讀的是《約翰克尼斯朵夫》，讀了一個假期之後，高二第一個學期寫作文，老師就說：「你作文寫得不錯。你可以代表我們班去參加作文比賽。」我從全班最後一名變成全校第一名，我覺得這個武林秘笈果然有效！我從此更加變本加厲不可救藥地迷戀文學作品了。後來把所有積蓄都拿去買書，而且只能買舊書。有一次，我把兩天吃飯的錢拿去買書，因為我在高雄逛書店看到一套全集，再加上一本《李白評傳》，剛好是我兩天餐費，九十塊錢，價錢非常合理。

許知遠：

我大概在十年前開始寫作。那時候文學開始衰微了，不論詩歌、小說都很弱，新聞業開始興起。所以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都是通過新聞業去表達。現在文化的變化特別大，文學已經跟不上新聞變化的節奏，新聞是更有效的方式，或者是捷徑。

所有作家最初寫作都是因為虛榮心。我們這一代沒有太多動盪，沒有經過饑餓，寫作只是為了 impress others，要讓人記住自己。當時我的夢想是做遊蕩者，我記得那時看海明威的《流動的聖潔》，一群人跑到巴黎，過著浪蕩生活，所以特別渴望將來到世界各地浪蕩，但同時骨子裡亦希望影響這個社會。慢慢地，我認識到所謂責任或公眾性，意識到社會有這麼多不公。中國在過去十幾年裡越來越封鎖，政治高壓增加，令我對美和正義有強烈的追求，這追求變得越來越強烈。如果這代人再不說話，就沒有人說話了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。

範文影響風格？

張大春：

一個作家，如果沒有第一使命，他起碼有第二使命，就是想辦法避免他的作品被選進教科書。當你的書很有趣時，它可以教育或感動很多人，可是一旦變成教科書，就一定變得沒趣。《論語》就是這樣。我初讀《論語》是讀沒有標點的。沒有標點的《論語》特別有意思，因為沒有壓抑，沒有解釋，沒有人告訴你它到底是甚麼意思。你自然而然地就跟它走，經歷文字的語感，而且可以有發掘性的創作。中國人背《論語》背了這麼多年，但至少到晚清之前，大家都沒搞清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的意思。大部分人都說是這個意思：早晨起來聽說了一件事，滿足了我的好奇心，因此晚上死了也沒遺憾。可是「朝聞道」裡的「道」根本不是「知識」的意思，它是「邦有道」、「邦無道」的「道」——我的政治理想獲得充分實現，或者國家富強有文化，文明達到鼎盛，這境界叫做「道」。在過去

成千上萬篇《論語》注釋裡，從來沒有告訴我們「道」應該如此解釋。閱讀教科書，就是一個記憶，一個理解，是定於一尊。文學作品變成了標準答案以後，它就不會算是作品。

但學生不用擔心課堂上的範文會影響風格。第一，我不相信一個人的風格會這麼容易被單一作品影響。第二，恐怕學生還未開始不斷模仿不同作品，形成風格。

張誦聖：

美國小孩的文學教育比較好。這關乎學文學的方法。美國二十世紀中期開始重視文學分析，會對文本做仔細分析。這文本分析方法已普及到中學、小學，學校不會指定給一個文本讓學生模仿，而是讓小孩讀文章，然後寫報告。在寫報告時用分析方法，令他們對文學有一個信念，我覺得這非常重要。



張誦聖



許知遠

互聯網有利創作？

章詒和：

我今年開了微博，大概有六十萬人關注。我是迫不得已。劉曉波獲獎後，我們被空前管制，管制到我的學生也不許和我來往，很鬱悶，我的人生自由和空間被抑壓……律師朋友說，你這個空間沒有了，我給你開另外

一個空間。這樣我就開了一個微博。我一直覺得微博對寫作有妨礙，但後來發現是促進了寫作，這促進有兩方面：一是你要把句子集中起來，在一百四十個字內完全表達，這絕對是功夫。另一方面，你會感覺到溫暖和鼓勵。創作很孤立，但孤立不是來自學生、同事、朋友，而是來自官府。我覺得這是中國現在最大的進步——我們在物質層面拋開了黨。微博提供了一個空間，可以打破傳統民間不能發言的封閉。

許知遠：

極權社會的封閉性，對思想的控制，令互聯網有明顯需要。互聯網體現出開放性，它強調透明性，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聯結，是對極權的一種反抗。但同時它們帶來相應問題。過去十年，我們看到它對舊文化的衝突。……所有人都是作家、沒有讀者的時代已經到來，但我最為擔心的是，我們經常高估時代變革的意義、影響及作用。

二十世紀初，有廣播、電影、大眾報紙雜誌的出現，那次也是一次新的體驗，如果沒有好的政治系統，它會進化成新的工具，對情感渲染化，對大眾心情系統地結合，就像當年日本及德國的模式。中國肯定也有這種危險，有朝著這個危險方向前進的可能性，這是我擔心的，包括對整個文化系統的破害和傷害，所以我的反應是非常的矛盾。

中國現處於資訊革命的第一代，有點像英國工業革命時，第一代和第二代要承受革命帶來的的雙重影響。一方面是工業解放，另一方面是巨大的壓迫。當年英國的壓迫表現在天空被污染，農村孩子要進入工場生產，過著悲慘生活。我這一代人也面對雙重性，第一，要面對巨大的解放，承受西方的衝擊和污染，要面對一個過分喧嘩的世界。

何為好文學？

鄭愁予：

我教過寫作班，那和國文課不一樣。寫作是創作，創作必須要有風格。



鄭愁予

但在國文課練習作文時，先不要想風格。有人寫作很多年後還不一定建立到風格，所以開始練習寫作時，先把漢語功能、特性掌握住，然後抒發真正的感情。寫詩要有靈感。每個人都有情緒的流動，當情緒的流動碰到一個景象，就會變得很集中，非常強烈，就會想表達出來。詩人的創作和畫畫一樣，都要配合。時間、場地，是詩之前的狀態，經過你知性和理性處理，便成為詩。

焦桐：

詩無非是把最準確的句子，放在最恰當的位置，有效地把情感跟音樂結合在一個形式裡面。像鄭愁予老師寫了這麼多膾炙人口的好詩，非常準確地把握他的情感。我特別欣賞鄭愁予老師的音樂性，他那種聲音是相當迷人的。

有些人寫詩，是一種形式，第一行二十個字，第二行兩個字，第三行三十六個字，第四行一個字，感覺好像是心臟病發作，或者是氣喘發作，不然沒有人有這種呼吸。我們知道，一個句子就是一個呼吸。譬如鄭愁予很有名的詩《賦別》，兩個人在風雨的夜晚分手，「這次我離開你是風 是雨 是夜晚」，我記得，是因為它的聲音很好聽，我整首詩都記著。

飽暖才能思寫作？

閻連科：

吃不飽肯定不能關心文學。否則寫得那麼好，還是會覺得特別頭疼。其實剛才章老師已經很清楚回答了這個問題。為甚麼齊白石畫得那麼好？因為他老去吃螃蟹。他吃那麼多的螃蟹才畫一件件小的蝦，所以不吃螃蟹，肯定是畫不到那麼小的蝦。

章詒和：

年輕人要用幾年甚至十幾年，才能解決就業、工資、住房、結婚、生子、醫療、養老的問題，這個壓力太大了。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，所有孩子們都是從事音樂、舞蹈、戲劇、電影、電視這類研究，藝術要靠鈔票，這個不能否認，絕對是靠鈔票。所以我跟孩子這麼講：第一，在不違法的前提下，你們趕緊去掙錢，然後他們掌聲一拍：「章老師，你太棒了！」老師在課堂裡一定要講真相，我們不能再講謊言，不能騙孩子說：「只要你努力就一定會成功！」在大陸，很多時努力也不成功，受歧視，這是為甚麼有這麼多孩子去殺人、去自殺。所以要養你自己，迅速在短期解決，以後才是甚麼文學、詩歌。

許知遠：

我不是特別完全同意章老師，但我非常理解章老師一代人整個被影響，被欺騙，說大家要食飽，要反對一種抽象的理想。其實在現今的中國和香港，年輕人已經沒有這麼直接的生活困難，當然房子、汽車都是問題，但大家都解決了溫飽，都能夠有一個基本生活，但整個精神世界是貧乏的，會把物質放大。

在中國大陸很明顯，你這個房子、這個車，你混得怎麼樣，並不能滿足你的精神世界，所以我感覺到精神世界的荒蕪，會帶來對物質世界變態的追求。我覺得重建整個思想世界更有意義。

鄭愁予：

沒有詩人能靠寫詩生活。寫詩寫多了更會惹禍。六朝時，大概所有有才之士——包括謝靈運——寫詩被抓，貴族寫詩，不小心會被殺害。詩人和藝術家非常接近，必須要寫真的東西，必須要寫景物，王國維說這叫「境界」。有人說，小說家能成就一番事業。但詩人在事業上成功的還沒見到。所以詩人是靠聖靈寫作，如果沒有聖靈，是寫不出好作品的。